

傅永军 总主编

“宗教、哲学与科学”书系

Farness and Nearness of
Metaphysics:
Heidegger and His Destructuring
of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的远与近：
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
之解构

陈治国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形而上学的近与远：
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
解构

作者：[德] 海德格尔

山东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宗教、哲学与科学”书系

傅永军 总主编

形而上学的远与近： 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解构

**Farness and Nearness of Metaphysics:
Heidegger and His Destructuring of Metaphysics**

陈治国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的远与近: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解构/陈治国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07-5102-3

I. ①形…

II. ①陈…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516.54 ②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954 号

责任策划:黄福武

责任编辑:黄福武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铁路印刷厂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9.75 印张 387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近代以降,宗教与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宗教、哲学和科学,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主要文化形态,在历史上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向来是人类精神文化史中的一个很有争议的主题。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都不能否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人类精神文化成长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是狭隘地理解宗教的历史、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而是试图科学地理解各种宗教的理论和实践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境域中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影响,又如何支配了特定时代的精神生活,那么,考察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一切与宗教具有互动关系的文化质素中,哲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哲学赋予宗教以理性工具,科学赋予宗教以真理形式,两者共同作用,消解着宗教的偏执和愚昧。而宗教则用信仰保持着哲学的神圣与玄妙、灵性与超越,用无限引导科学“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而它们之间的互动则提供了不同文化质素之间的碰撞、对话和融合的历史经验,弘扬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使人类学会更有智慧地对待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促进人类精神文化的健康成长。因此,追溯宗教的历史形态与现实影响,显然无法回避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对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透彻把握,单纯的宗教研究,或者单纯的哲学研究以及科学研究都无法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因为如此,最近二十年来,国内宗教学者和哲学学者投入了很大精力研究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的互动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或著作也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然而,相对于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宗教学者和哲学学者的研究仍显薄弱。无论是历史性考据研究,还是理论性学理研究以及现实性实证研究都稍显粗糙,具体的研究还很不够,亟待深入和加强。

有鉴于此,2004年,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启动之时,作为建设项目之一的“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自然而然地就把“宗教、哲学与科学”列为项目的分课题之一,由我作为主持人组织研究团队展开研究活动。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团队的研究人员分别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以个案研究方式探索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的

关系的某个方面,譬如,将研究聚焦在某个哲学家(科学家或宗教思想家)身上,特别聚焦于这位哲学家(科学家或宗教思想家)有关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关系的思考。看起来这些研究成果缺少“宏大叙事”,谈不上是对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进行解析的“妙舞清歌”。但是,在我们看来,比起那些凌空蹈虚的高谈清论,老老实实地研究点问题反而对人类知识的增长更有助益。

现在,我们以“宗教、哲学与科学”书系形式将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公开出版,接受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批判。不管怎样,这些著述都是每位作者的用心之作,它们代表了山东大学现阶段关于宗教哲学以及宗教与其他文化因素(主要是哲学和科学)之关系方面研究的最新思考,当能为汉语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宗教、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本书获得了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傅永军

2008年7月于山东大学

序 一

我与治国君相识相交已有十余载的历史。作为其首部书稿,《形而上学的远与近: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解构》也是他十多年来在现象学和诠释学领域持续耕耘、用心探索而成的一部著作。

我们知道,形而上学是哲学领域中的核心事业,它也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是其思想的重点和难点。《形而上学的远与近》一书着眼于海德格尔整体思想的发展来探究他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缕析这种关系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实际的意义与效应,立题富有新意,论证严谨、细致,并提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真知灼见,其学术价值不容置疑。

首先,不同于学界关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两期说”、“一贯说”等流行解释观点,该书以海氏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为主线,将其划分为“现象学的十年”、“形而上学的十年”、“克服形而上学阶段”,并具体阐述了各阶段的理论旨趣、方法取向和特征表现等,同时将三个阶段作为一个逻辑融贯的发展线索来统一考虑,并探究了各阶段之间的概念衔接和思想呼应关系,凸显了全书设计的整体连贯性。

其次,紧密围绕海德格尔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形成的“形而上学具有存在论—神学的二重性进路”这一重要论断,该书详尽地论证了这一论断不仅出自于海氏对形而上学的解构性重演,而且适用于他在此之前的存在之思,也就是说,1917~1927 年基础存在论具有本质—先验追问方向的存在论进路的基本特征,1927~1937 年“后存在论”则属于实存—超验追问方向的神学进路。这种探究方式和探究结果,一方面高度体现了作者批判性的、独立性的哲学研究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刺激我们更加谨慎和合理地来审视海德格尔思想的旨趣与成就以及各种流行的解释与评估。

复次,该书将解构看作是贯穿于海德格尔三阶段处理形而上学的基本方法原理,将这种方法原理的根本精神阐明为:通过与传统思想的对话,揭示出在传统那里已经内在地发生作用但又未曾明言或者尚未被发掘出来的东西,从而既促进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也努力展现传统所能够提供的可能发展空间。进一步,作者还详细区分了这种方法原理在三个阶段不同的运用、意义和特点,大大丰富了对海氏的解构方法及其与形而上学诉求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也为把握解

构这一海氏一以贯之的方法原理,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再次,作为“形而上学的远与近”这一主要研究意向的最终揭示,书稿最后指出,无论是晚期海德格尔本人言说存在的方式,譬如,“天、地、神、人”四重整体观念,还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哲学领域的实践哲学转向,也无论是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宗教言说方式,还是中国哲学之当代发展的路径设计,都依然处于远离但又切近形而上学的悖论性状态。这种探究表明,该书不仅仅止于“哲学史”研究,而且还着眼于中国哲学和未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循着海德格尔思想的开启之路,深刻反思当下哲学现状,来探索哲学本身的活动方式和可能进展。

此外,该书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整理、评论和运用非常到位,令人印象深刻,对海氏相关著作的指涉十分广泛,并能作出精到分析,很好地服务于研究主题。该书的另一大优点是:虽然所论问题抽象,海氏本身的表达亦十分晦涩,但该书的论述既不失应有的专业学术语言风格,又能拨艰涩而求清晰,做到层次分明,文字流畅,实属不易。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不能回避或有待于进一步澄清的问题。譬如,结论部分由于所涉论题较为宏阔,关涉复杂,在分析和论证上稍显薄弱和宽泛。其中,有关中国哲学发展方式的论述也需要进一步的商讨。不过,毋庸置疑,《形而上学的远与近: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解构》属于现象学与诠释学领域一项相当出色的研究成果,也希望治国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在学术生活中作出更大成就和贡献。

洪汉鼎
2014年3月

序 二

从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始,治国的学术关注点就没有离开过现象学,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就以胡塞尔哲学为研究对象。后来尽管他的学术兴趣溢出现象学范围,涉猎广泛,但他哲学探索的着力点之一,依旧是现象学的众多话题。他硕士毕业就留校任教,全因当时的领导认为他勤奋负责,且功力尚佳,前途无量。转瞬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则是他博士论文的修改和扩充稿。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此时无疑很是欢喜。但当他嘱我为其书作序时,我又忧心和忐忑起来。

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都知道,所谓“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分野无疑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西方世界的“哲学心”从未像今天这般撕裂过,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用“西方哲学”一词来统括它们。面对横亘在二者之间的这道“鸿沟”,我们似乎只能“选边站”。西人如此,国人亦如此。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界,但凡研究西哲的人,均受困于“分析”或“欧陆”的选择。在这种“党派色彩”的影响下,我们中国学界自觉其学术旨趣为“分析的”学者,定会痛骂“欧陆哲学”不是东西,反之亦然。

治国在开始研究现象学时,我就多次嘱其要有“跨党派”的视野,多从“鸿沟”的两边来考虑。因为在我看来,除了“分析的”和“欧陆的”在研究主题上多有交叉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不同的“风格”。Bernard Williams 曾经说,分析哲学的目标在于追求“清晰”。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三方面下工夫。一是做好论证,二是用好分别(Distinction),三是使用最清晰平实的言说方式。就前两点而言,难道“欧陆哲学”就不做论证和分别吗?以现象学为例,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他们就不论证、不分别吗?当然不是。不过,就第三点来看,确实二者差别很大。分析哲学的言说方式维持着自然科学和常识的风格,而欧陆哲学的言词就更“人文化”。所以,我当时要求治国尽力用清晰的和论证的方式来谈海德格尔的哲学,而不要将海德格尔“老庄化”或“佛陀化”。前面,我说我的“忧心”和“忐忑”也就主要源于此。因为,我担心治国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毕竟他缺乏对分析哲学的足够好感和亲近。

无疑,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自《存在与时间》发表以来,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已有无数的成果。因

而,任何一个后来者意欲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均是一件十分困难之事。治国斗胆一试,既显示了其学术自信和牛犊之气,又无形中将自己拖入了一个困境之中,其煎熬可想而知。且不说海德格尔自身作品的艰涩繁难,单就第二手研究资料的浩繁就足以令任何一个青年学者却步。另外,如无对形而上学这门学问本身的理论研究,也很难深入探寻下去,因为只是梳理海德格尔本人的观点和立场既会失之偏颇,又会落入阐释的老套。

我们知道,在这个课题方面,西方学界基本形成了两大派。一派为“消解派”,认为海德格尔基本延续了自笛卡儿—休谟以来的传统,将形而上学从哲学中驱除出去。一派为“拯救派”,认为海德格尔实际上是明批暗救,以现象学—诠释学的方式完成了“形而上学的救赎”。两派理据十足,难分高低。治国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第二种传统,肯定了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和“指路价值”。

但治国的论理是否充分和精当?结论是否可以成立?这要从多方面来分析。首先,他的这个研究属于广义的“哲学史研究”,尽管他试图从中找出启示的意义,为未来形而上学的研究指出一条出路。因此,我们须关注他的资料分类使用和创造性释义的各项工作。在资料使用方面,对海德格尔本人的相关重要文献采用了一些德文版本,并部分地参照了一些英文、中文译本,而德、法语的研究文献甚少。这无疑是一个局限。其次,在中、英文研究资料方面收寻颇为充分,各主要研究者的作品均有关涉和分析,文献的条分缕析也着力甚深,其解释散发出独特的味道和一定的哲学想象力。

而该书给人的另外一个深刻印象,则是治国对海德格尔本人哲学思想演进的一种新的分期法。他所给出的“三期说”不只是对海德格尔思想进行简单的时间划分,更重要的在于从这种分期中厘清海德格尔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以及如何走出形而上学思维的困境。可以说,这是该书的主要创新之处,在国内外属首见。因为,国际上大多数研究者采取“前期后期说”或“一以贯之说”。治国的“三期说”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推进了对该问题的研究。

在写作过程中,我与治国讨论最多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不囿于单纯哲学史料的耙梳、分析、解释和思想还原的工作,而是努力从“普遍哲学”的要求和角度,从中国哲学和未来西方哲学发展的角度,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理论构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治国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特别指明了海德格尔的存在探索对未来哲学的意义和多种可能性。这样,就使其研究具有超越哲学史研究的优点,体现出作者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批判意识。这种能从单纯哲学史的研究态度中跳出,循着海德格尔思想的开启之路,深刻反思当下哲学现状,获得思想的进步的追求之积极姿态,应是一个学者的本然品性。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语言保持了作者的一贯风格,清晰而不失老道,言简而具意味。虽说治国热衷“欧陆哲学”,但并无过分艰涩之处,其论

证的逻辑清晰可见，给出的结论也具有充分的论据，几个难点也给出了较好的说明。

诚如我当面给他指出的那样，该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结论部分尚显仓促。尽管目前这个稿子较以前有了一定改进，但由于所提问题太大，关涉复杂，过分宏阔，许多地方尚缺乏细微的分析和论证，给人潦草的感觉。其次，“三期说”的理据和文献根据有待加强。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该书的关键之处，应有更多的铺陈和提升，以免授人武断之嫌。再者，许多文字表达应更有约束，概念使用应有明确的内涵，避免过多的“修辞化”或隐喻式使用。当然，这对一个热衷“欧陆哲学”的学者来说，能做到目前这样清晰说理，已实属不易。可以说，这本书是目前国内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众多专著中最为清晰的一种，亦是我所真正期待的那种。

刘 杰

2014年6月

凡 例

一、关于本项研究中所有引文的注释,兼顾清晰与便捷起见,所采取的策略是:凡来自于海德格尔原始文献的引文,仅仅标注简略出版信息,包括作者、文献名称、具体页码,至于更为具体的信息可以参见书末的“参考文献”;凡来自于海德格尔研究文献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引文(极个别除外),一律标注详细出版信息,同时亦可参酌“参考文献”。

二、引文和正文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特殊语词加注的方式。凡是引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一般为原文所有;引文中圆括号内的文字,一般为笔者所注,如有特殊情况则特别说明。而正文中的圆括号内的文字皆为笔者根据语境和相关需要加注。

三、文中所出现的非常见之外国人名,一般都是在首次出现之后加注外文,其后则略。

四、文中关于部分海德格尔原始文献所加注的年代,基本上都是著述年代,而非初次出版年代。海德格尔原始文献的名称,若非必需,大多都省去副标题。

五、关于文中所出现的希腊语词的写法,基于引文的原貌和讨论的语境,并未在希腊写法和拉丁写法之间进行统一。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框架: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关系视野下的思想分期问题	(3)
第二节 研究的历史与新路径的开辟	(18)
第一章 形而上学的本质:存在论—神学的二重性进路	(47)
第一节 研判的动力:从政治—伦理的虚无主义到形而上学之本质	(48)
第二节 研判的内涵:存在论与神学的二重性建基	(51)
第三节 研判的后果: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与朝向另一开端	(80)
第二章 基础存在论:本质—先验方向的存在论进路	(112)
第一节 基础存在论的一般构成	(112)
第二节 基础存在论的存在论特征	(130)
第三章 后存在论:实存—超验方向的神学进路	(138)
第一节 后存在论的基本构想	(138)
第二节 后存在论的神学品格	(169)
第三节 后存在论的遗产	(187)
第四章 方法问题:作为方法的解构	(193)
第一节 解构方法的三重形态及其运用	(193)
第二节 解构方法的历史之源及其一般结构	(210)
第五章 形而上学之解构与神学的三重关系	(231)
第一节 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来源	(231)
第二节 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向度	(238)

第三节	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意义	(246)
第六章	形而上学的远与近	(254)
第一节	“天、地、神、人”四重整体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256)
第二节	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	(277)
第三节	宗教言说与形而上学	(280)
第四节	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方式与形而上学	(282)
参考文献	(285)
后 记	(299)

导 论

在此将要展开的是切近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一项探索性努力。而切近一位天才性哲学家伟大之思的路径一般无外乎两种选择。第一种路径选择是由外观内。由外观内大致又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发生学的道路,即按照思想史的发生顺序,以某一基点为开端,循循伸展,步步为营,最后收获其“历史结论”。其二是分析学的道路,即面对一个庞然整体,以某一切口为支点,层层剥离,渐渐深入,最后揭窠其“核心思想”。第二种路径选择是由内观外。由内观外形式不一,但主要是在细细端详、揣摩、品味其思想主脉和走向的基础上,直击其思想中心,然后以此为绳墨,统观、诠释其余枝叶和权蔓,同时回观、验证此一绳墨之效力与权能。

在汗牛充栋般的海德格尔研究作品中,采取第一种路径选择即由外观内而收获累累硕果者,不乏其例。但是,依笔者拙见,相比之下,第二种路径选择当为更需努力之方向。原因有二。其一,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盘根错节、繁复冗杂,时而曲径通幽,时而斜枝横溢,究竟是否存在着一以一以贯之的规整大道,颇为可疑。其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并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体系,作为不懈追问存在意义或存在真理的思想“游戏”,其旨趣可能就潜藏于不断徘徊往复的行思之途。海德格尔在1976年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内,明确回顾性地表白说,长达近乎七十年哲学生涯的工作乃是“通向不断变化地追问多重性存在问题的道路领域之途”^①。所以,当强行剥离种种行思的道具或拐杖,最后呈现出来的极有可能是空无一物。职是之故,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路径选择,尽管这不一定是唯一的最佳选项,尽管这并不能完全脱离第一种路径选择。

而当我们在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进行反复的对峙、周旋中决定性地来到其思想的中心地带,扑面而来的就是: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当然,这样一种发现并不会随即为我们带来多少欣喜和安慰。因为,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相互牵引又时有冲突的矛盾综合体。这并非虚言。

难道作为编外讲师的海德格尔不是以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总体性抗争之姿态步入学术舞台的吗?正如奥特·珀格勒(Otto Pöggeler)所观察到的,“他的讲课稿,以及尤其值得指出的写给卡尔·勒维特(Karl Löwith)的书信,都

^① Dorothea Frede, “The Question of Being: Heidegger’s Projec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 Charles B. Guign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2-65, at 42.

透露了他的拒绝,那种清除的欲望,以及对一切事物的极不满意”^①。但是,“20世纪还有哪位思想家比他更加追随形而上学的轨道,描绘它的构成性差异,衡量它的结构并且赋予其以统一性?……难道他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家——我们时代最原初、最有力的形而上学家——吗?换句话说,难道他不是把形而上学带至极端边界——类似章鱼倾空了它的墨汁——以至于现在每一事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play out)吗?”^②

难道海德格尔在基础存在论的分析中,不是断言传统形而上学的大师们别无例外地遗忘了存在从而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吗?但是,存在历史观念背景中形而上学之存在的遗忘又转而成为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传统思想家们对于存在之天命的持续回应。

难道海德格尔面对遗忘存在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不是希冀“另一开端”吗?但是,此“另一开端”与遗忘存在的“第一开端”仍然处于难分难舍的纠缠之中。海德格尔在作为其哲学秘籍的《哲学文献——从本有(Ereignis)而来》(1936~1938)中明确写道,新的开端只有“当第一开端被带入适当的视野才是可实行的”^③。

显而易见,这里的任何一组宣称带来的都是无尽的困惑和挑战。

然而,问题不止如此。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宣称,对于我们关于整个源于古希腊、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西方哲学的一般认知,也构成了严重的“挑衅”和刺激。

一般的正统哲学观念教导说,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西方哲学体系都是三足鼎立的固定构架: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三大部门。并且,在一般的思想运作中,作为哲学入门的“知识论”,其对象的“真”,往往被理解为超越存在物的“超越属性”之一。因而,知识论的目标,一向锁定在建立作为哲学之体的“形而上学”。在确立了形而上学层次的原理原则之后,就以之落实到作为哲学之用的“伦理学”。“这条从知识论经形上学到伦理学的思想进路,万古常新,一成不变。”^④然而,海德格尔宣称,哲学只有一个部门,即以存在论为基本事情或课题(subject-matter)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第一哲学”,并不意味着“次序上”的命名,而是意味着“唯一的”或“真正的”哲学。

一般的常规哲学史理解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存在论,经由近代的知识

① Otto Pöggeler, “Destruction and Moment”, in *Reading Heidegger from the Start: Essays in His Earliest Thought*, eds. Theodore Kisiel and John van Bure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p. 137-156, at 137.

② Dominique Janicaud and Jean-François Mattéi, “Forward”, in *Heidegger from Metaphysics to Thought*, trans. Michael Gend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xxix.

③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p. 41.

④ 邬昆如:《“知即德”在西洋传统知识论的前因后果》,载(台北)《哲学与文化》2007年4月第362期。

论转向,进而发展为现代的语言性哲学。亦即,在西方哲学 2500 多年的发展史上,存在着一系列有迹可循甚至是特色鲜明的范式转换和重心更迭。然而,海德格尔论证说,哲学就是并且仅仅就是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追问——无论是阿那克西曼德还是赫拉克利特,无论是康德还是尼采,均无例外。

一般的主流哲学教科书的刻画是,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西方哲学历史的演进中,矗立着一个个竞争性的、复数的形而上学体系,它们虽然并非不共戴天或不可沟通,但是它们首先是对峙性的、抗衡性的,犹如黑格尔所言,哲学就是“堆满尸体的战场”。然而,海德格尔断言,形而上学只有一个,貌似对立的各个体系实际上是同质性的,是“一丘之貉”。

一般的西方文明的图景是,分别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动力的雅典精神与犹太教—基督教及其神学——或许还有罗马法典——在相互冲撞、相互磨合中共同塑造并支撑着西方社会文化的整体气质和历史命运。然而,海德格尔反驳说,源出于希腊的形而上学既典型地确立了世俗化的理性精神,也深刻地蕴含着神学的理论向度,具有一种双重的结构。

凡此种种,让人困惑不已,也让人惊愕不已。引发这种困惑和惊愕的,正是海德格尔那种持续不断而别具一格的形而上学之解构。而这种形而上学之解构也正是我们这项研究将要集中追踪和解析的基本课题。

不过,当我们决定性地尝试以“形而上学之解构”来刻画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之际,潜在的危险和可能引起的种种质疑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其原因不仅在于“解构”(Destruktion, destruction/destructuring)一词在当前学界的含混使用状况,更在于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关系本身的复杂性。有鉴于此,我们将首先对这种漫长而繁复的关系之展开历程作一提示性的说明,从而为本项研究的展开提供一个基本框架,或者说我们要在这里首先摆置出基本的研究预设。

第一节 研究框架: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关系视野下的思想分期问题^①

如所周知,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遭遇在海德格尔漫长的学思生涯中可谓是相当早远的事件。换句话说,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俘获了年轻的海德格尔。根据海德格尔的晚年回忆,当他 18 岁的时候,作为高中二年级的神学生,他就家乡梅斯基尔希收到了朋友兼精神教父格律博(Conrad Gröber)——后来由于二战中坚守反纳粹的立场而赢得了广泛的声望并成为弗赖堡地区的大主

^① 本节初稿曾以《从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再论其思想分期问题》为题,提交并宣读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诠释学与中西经典文化传统”——第七届“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济南,2010年8月13~17日),修订稿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